

November 2020

The Progressive Logic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and Its Theoretical Reflection

Daren La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Lai, Daren. 2020. "The Progressive Logic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and Its Theoretical Reflection."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0, (6): pp.1-9.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0/iss6/19>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当代文论变革发展的演进逻辑及其理论反思

赖大仁

摘要:从学术史角度看,当代文论变革发展及其演进逻辑并不是简单的直线性推进,而是颇为复杂的螺旋型循环演进,具体而言构成了三轮即三个阶段的破、引、建交织互动的变革发展。当代文论的外在发展轨迹与内在演进逻辑,从表层结构方面看,与处于历史大变局中的社会文化结构有关,也与近百年来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变革发展相呼应;从深层结构方面看,反映了文学研究内与外关系维度上的辩证运动和演进逻辑。一是凸显了“文学论”的关系维度,关涉对文学特性与功能的理解以及文学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的认识;二是凸显了文论资源的内外关系维度,关涉内承传统与外引资源之间的关系问题。对当代文论变革发展的理论反思,关涉破、引、建三个方面的目标指向和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关键词:当代文论; 变革发展; 演进逻辑; 理论反思; 历史启示

作者简介:赖大仁,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通讯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紫阳大道99号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330022。电子邮箱:daren81@sina.com。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40年文学理论问题论争研究与文献整理”[项目编号:19AZW002]、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新时期文论四十年变革发展与理论反思”[项目编号:18WX01]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Progressive Logic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and Its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of scholarship,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does not transform or develop in a simple linear fashion, but rather evolves in a more complex spiral cycle, which specifically constitutes three rounds of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namely, the three reciprocal stages of breaking established traditions, introducing foreign theoretical resources, and constructing new critical ideas and forms. The external track of development and internal logic of progress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are, on the surface, related to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structure in the context of grand historical changes, and echoes the development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 the past century. Viewed from its core,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reveal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and progressive logic of the internal and the external in literary studies. First, it foregrounds the relational dimension of “literary theory,” which involves the understanding of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as well a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laws of literature. Second, such development highlights the relational dimens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literary theory resources, that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inheritance of internal traditions and the reception of external resources.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upon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engage studies of the goals and major inquiries during the three stages,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which are worth exploring.

Keywords: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reform and development; progressive logic; theoretical reflection; historical illumination

Author: Lai Daren, Ph. D., is a professor of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in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areas include literary theor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Address: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99 Ziyang Avenue, Nanchang 330022, Jiangxi Province, China. Email: daren81@sina.com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Key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 of China (19AZW002) and the Key Project of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Program (18WX01).

近年来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背景下,对于当代文论变革发展的回顾总结与理论反思,已经形成新的研究热点。当代文论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变革发展历程,显然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正如学者所说:“新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由于处在开放多元的时代,新论层出、新潮迭起,各种观点错综交织,充满复杂性,许多问题至今仍未尘埃落定,如何总结这段当代文论史,难免见仁见智。”(鲁枢元 刘锋杰 2)从近年来学界的研究情况来看,研究者往往会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出发,以不同的阶段划分来进行回顾和总结,由于观照视角不同,所进行的总结分析和阐述的理论见解也各有不同,能给予我们不同的理论启示。但这些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即都是把当代文论变革发展看成一种直线性的历时态演进,这种认识把握显得比较单一,没有充分揭示其复杂性。实际上,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当代文论的变革发展,无论从范式转型还是理论转向来看,发展轨迹和演进逻辑都不是简单的直线性推进,而是颇为复杂的螺旋型循环演进,对此值得我们转换一下观照视角来进行研究探讨,并进行必要的理论反思,从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推进新时代文论创新发展。

一、当代文论在破、引、建交织互动中的变革发展

从总体上来看,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论的变革发展,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外各种理论资源彼此冲突与融合的现实语境中,在破、引、建三者交织互动的作用下变革发展过来的。所谓“破”即破除此前所形成的文学理论观念与模式,“引”即引进国外各种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理论资源,“建”即重建适应当下社会和文学发展要求的文学观念和文论形态。这既是对20世纪初中国文论变革发展的历史回应,同时也是当代文论一种新的循环演进。当然,从当代文论发展演变的轨迹来看,它并不是简单的历史回归和直线性推进,而是构成了颇为复杂的螺旋型循环演进。具体而言,它至少构成了三轮即三个阶段的破、引、建交织互动的变革发展。

第一轮是破、引、建三者交织互动中的突破与探索。从新时期初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这十多年,是第一个阶段的变革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首当其冲的是“破”,即破除长期束缚文学发展的僵化文学观念与理论模式。这个阶段的主要“文论事件”,有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恢复现实主义传统、文学“向内转”与形象思维论、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等问题的讨论。这些文学理论问题论争的意义,首先在于破除为政治服务和机械反映论等理论观念的禁锢,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这是推动文学实践创新发展的首要前提。实际上,当时这种突破并不那么容易,各种激进和保守观点的争论十分激烈,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思想观念的裂变与冲突,但这种文学观念的突破和解放显然是一种必然趋势。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引”,即大力引进外国文论特别是西方现代文论资源,如象征主义诗歌、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先锋文学、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和神话原型批评等。外国文论的引进与借鉴,一方面让人们眼界大开,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旧文学观念的激烈冲突,由此引发了文学研究方法的大论争,成为当时影响甚大的“文论事件”。从引进与借鉴的实际效果来看,它一是有力促进了对过去文学观念的突破,为其提供了突破的理论参照;二是直接影响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探索,当然也存在直接模仿和照搬的问题;三是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和促进了新时期文论的理论重建,这无疑是我们更值得重视的方面。

这个阶段的“建”,是在破与引的合力作用下的结果。一方面,突破过去文论观念的束缚是一种普遍要求,但实际上又不可能把它完全抛弃;另一方面,引进和借鉴外国文论资源是迫切需要,但也不能简单照搬和模仿,因此就需要在这两者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此时的重建策略,是在反思和改造过去文论模式的基础上适当吸收外国文论的新东西,进而重建新的文学观念和理论形态,以适应新时期文学的创新发展要求。比如现实主义文论重建,首先是对过去伪现实主义进行批判反思,对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重新认识,重新恢复和确立现实主义文学真实性的基本原则,努力吸收外国各种新现实主义的理论观念,在这种合力作用下重建新的现实主义理论形态,从而对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又如审美意识形态文论,一方面是对过去意识形态论文学观念的扬弃,另一方面受国外美学思想的影响,力图用审美论去改造原来的文论形态,从

而达到审美论与意识形态论之间的有机契合。虽然学界对这种理论形态一直存在争议,但从历史观点来看,它的理论探索意义以及对文学实践的影响,都值得充分肯定。再如文学主体论的理论建构,应当说是“文学是人学”理论观念深化发展的结果。它积淀了此前人性论与人道主义讨论的成果,也是对五四时期“人的文学”和20世纪50年代“文学是人学”讨论的历史回应,并且吸纳了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文论的理论资源,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和深远影响。还有后来的新理性精神或新人文精神文论形态,是在市场经济改革和大众文化兴起的背景下,针对文学精神价值取向面临的新挑战,在关于人文精神问题大讨论中努力建构起来的,对文学在市场化 and 大众化变革发展中的精神价值取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总的来看,这个阶段文论创新重建充满了生机活力,取得了显著成绩并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形成了新时期文论的新格局。

第二轮是破、引、建三者交织互动中的突围与拓展。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前十几年,是当代文论发展变革的第二个阶段。

从“破”的方面来看,这一阶段除了延续对新时期以前文论的批判性清理以外,还包括对新时期以来重建的文论形态进行理论反思和突破。这一阶段的主要“文论事件”,一是关于中国文论“失语症”的讨论。有学者认为,从20世纪初以来,我们过于激烈地批判和消解了中国文论传统,大量引入和移植西方文论话语,造成中国现代文论的严重“西化”倾向;新中国成立后又照搬苏联文论话语,导致中国当代文论的明显“苏化”倾向;改革开放以来再次全面引进和移植西方现代文论话语,新时期文论建构仍然是外国文论话语占主导地位,这是一种严重的“失语症”现象。当代文论要创新发展就必须破除这种理论迷误。“失语症”的讨论切中时弊,在文论界引起很大反响。二是关于“文学终结论”的讨论。它旨在破除新时期以来着力建构起来的审美论文论形态,以及精英化、经典化的传统文学观念,认为在大众文化时代,传统文学形态不断萎缩乃至走向终结,代之而起的则是后现代消费主义文化,因此传统的以经典文学为对象、以“文学性”为目标的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也将难以为继而走向终结。这种

观点虽然引起很大争议,但它所形成的冲击力却显然无可回避。三是当代文论的“反本质主义”讨论。它主要针对当代文论的理论模式进行批判反思,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文论的根本问题在于始终受到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困扰,不仅新时期之前的文论模式是本质主义的,就是新时期以来重建的各种理论形态也仍然没有摆脱本质主义的羁绊,这在一些影响很大的文学理论教科书中显得尤为突出。他们极力主张破除这种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和理论模式,走向当代文论的开放性发展。总的来看,这个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理论突破具有相当程度的颠覆性。

上述理论突破同样关涉“引”的问题,只不过各有不同的理论主张。“失语症”论者显然反对继续引进外国文论,主张开掘中国传统文论资源进行理论重建,认为这样才能使当代文论面貌得到根本改变。“文学终结论”本来就是从西方学界引入的理论命题,它当然需要引进更多的外国理论资源来加以支撑,包括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大众消费文化理论、“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文化诗学”理论、“文化研究”转向理论等。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些理论学说被大量翻译介绍进来,并迅速形成各种文化理论研究热潮,与“文学终结论”遥相呼应。“反本质主义”命题也是从西方学界引入的,只不过引入之后主要是针对中国当代文论,相应引进的理论资源主要是西方解构主义哲学和美学理论、解构主义文论与文学批评、各种后现代反本质主义理论等。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引进西方现代主义文论资源,那么这个阶段则主要是引入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资源,形成破与建的理论支撑。

这个阶段的“建”也是各取所需,有不同主张。“失语症”论者提出了“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命题,主张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础,通过现代转化来重建当代中国文论,学界对此进行了多年的专题讨论,产生了很大学术影响,然而这种转化重建的实绩却似乎并不理想。“文学终结”论者主张破除过去狭隘的“文学研究”观念而倡导走向“文化研究”,并且致力于建构将文学纳入更宽泛视野的跨学科文化研究范式,但从实际成效来看,这种建构努力显得目标不清和过于杂泛,也乏善可陈。“反本质主义”在极力解构过去文论研究范式的同时,提出了各种建构主义主张,有的追求

建构历史性、地方性的文论知识系统,有的寻求在关系主义思维框架中描述文学理论知识图景,有的借鉴国外关键词研究范式而走向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关键词研究,还有的借鉴国外知识考古学研究思路而走向文学理论知识学或知识生产论研究等。总的来看,这个阶段的变革发展再次打破了新时期以来形成的文学理论格局,出现了更加多元开放的发展走向。但比较而言,这一轮变革发展的理论建构显得不足,没有形成比较系统和富有阐释力的理论形态,它对文学实践的积极介入和影响作用也比较有限。

第三轮是破、引、建三者交织互动中的反思与重建。2010年之后中国社会以新的姿态进入“新时代”,在倡导重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当代文论也相应调整姿态,自觉加强了基于文学理论本体的反思与重建,从而寻求向文学研究的回归和深化。

这个阶段的标志性“文论事件”,是关于“强制阐释论”和“理论中心主义”等话题的讨论。其理论指向首先是“破”,一方面是破除对西方文论的盲目迷信,旨在增强理论自信;另一方面是破除当代中国文论自身的理论迷误,旨在唤起理论自觉。就前者而言,主要针对当代西方文论的一些根本缺陷,比如强制阐释,用场外征用的各种文化理论强制阐释文学作品,根本不顾作品文本的自在意义;又如理论中心主义,崇尚理论为王、理论至上,脱离文学实践和文本对象成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造成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本体迷失。从后者来看,当代中国文论盲目追逐西方文论潮流,加上自身在变革发展中的焦虑与浮躁,也是越来越脱离文学实践经验和时代发展要求,陷入了失去文学本体目标的理论迷误。面对这些现实问题,显然需要进行理论反思,只有破除对西方文论的盲目迷信和当代文论自身的理论迷误,才能重建当代中国文论的自觉与自信。

由此,它同样关涉如何对待和处理“引”的关系问题。一是引进和借鉴文论资源不能单一化,除西方文论之外,还应当引进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古代文论等,让其发挥作用。如近年来兴起的阐释学文论研究,除了引入西方阐释学理论外,也注重了中国传统阐释学理论资源的开掘与阐发,这显然有重要意义。二是无论引入什么样的理论资源,都不能消极被动地照单接收,只是跟在别人

的理论后面进行推销和炒作,而是应当强化自我主体精神,走向双向互动“对话”和真正为我所用。近年来在阐释学文论、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研究等领域,显然都更加强了与国外学界的交往,既有请进来,也有走出去的双向对话讨论,显示出一种新的积极变化。三是理论资源引进之后的充分讨论也十分重要,有利于辨识其优劣与利弊,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才真正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使其真正发挥积极作用。自从“强制阐释论”问题提出以来,文论界针对西方文论引进的讨论增强了不少,这显然是一种积极的变化。

近年来在展开“强制阐释论”问题讨论的同时,学界再次提出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重建”的命题,并显示出这种理论重建的发展趋向。例如,针对“强制阐释论”的批判反思,相应提出了“本体阐释论”和“公共阐释论”等建构性论题,不少学者都被吸引和参与到这一研究中来,形成了当代文论研究中的一个理论热点。通过认真梳理中外阐释学理论传统,确立当代文学阐释论建构目标,深入探讨其中的具体问题,这种理论研究得以不断推进和取得实际成效。又如,针对此前文化研究转向中过于脱离文学实践,以及过于去文学化、去情感化、去审美化等带来的问题,也开始出现文学审美论、文学情感论、文学意义论、新现实主义文论,以及伦理学批评、新审美批评等研究的回归与理论重建。这一方面是受到当代西方文论“后理论”转向的影响,开始从“理论”逐渐回归“文学理论”;另一方面则是呼应当今文学的新发展,要求文学研究回归到对文学意义的关注上来。此外,适应新时代文学发展的各种新文论话语形态也正在逐步建构起来,如当代新媒介文学研究及其理论建构、当代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及其理论建构、当代科幻文学研究及其理论建构、当代人工智能写作研究及其理论建构等,也都显示出良好的发展趋势。总的来看,这一轮破、引、建交织互动中的反思与重建,又一次打破了前一时期形成的以跨学科文化研究为主导的格局,将当代中国文论的创新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当然,这种创新发展的建设性成就可能显得不足,但其发展前景应当是清晰可辨和值得期待的。

二、当代文论变革发展的演进逻辑

从近年来我国学界对当代文论变革发展的研究情况来看,都并不只是从各自的观照角度对这种变革发展进程加以描述,同时也必然涉及对其内在演进逻辑的认识分析,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有学者认为,新时期文论的发展历史大体可以分为突破、发展与建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6年,是对旧的受到“左”的僵化思潮严重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突破的阶段;第二阶段从1987年到1996年,是我国文艺理论全面发展阶段,各种新说纷纷涌现,层出不穷;第三阶段从1997年至今,是我国文艺理论逐步走向独立的理论建构时期。当然,这三个阶段不是截然分开而是互有交叉重叠,反映了一种理论的发展趋势(曾繁仁 1)。这种描述和认识分析比较清晰,但总体上把突破、发展与建构看成三个阶段的线性推进,则未免有些简单化。也有学者把新时期文论发展史描述为崛起期、转型期、综合期三个阶段,1978年至1989年为崛起期,主要特点在于“拨乱与反正”,即重新阐释文学特性,把当代文论与批评范式从社会政治范式调整转换到审美范式上来,建构起以文学审美为核心观念的理论模式;20世纪90年代为转型期,主要特点在于“受困与固本”,即寻求文论话题的重建,使当代文论与批评范式从审美范式再次调整转换到文化研究范式上来,实现文学理论观念与模式的再次转型和多向度拓展;21世纪以来为综合期,主要特点在于“分途与坚守”,即再询文学的意义,在更宽广的视野中重新认识文学的意义价值(鲁枢元 刘锋杰 39—104)。论者的总结分析主要着眼于当代文论与批评的理论范式转换,将其概括为从社会政治范式调整转换到审美范式,再调整转换到文化研究范式,然后进一步走向寻求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分途和综合发展。这种理论视角无疑很有意义,但把新时期以来文论与批评的变革演进看成“崛起期-转型期-综合期”的历时性推进,同样有一个是否过于简单的问题。还有学者从当代文论问题论争的角度观照,把新时期以来的文论划分为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三个阶段进行总结。第一阶段

先是兴起了关于文艺与政治、形象思维、人道主义和人性论问题的讨论,然后是方法论和文学主体性问题讨论,以及从审美反映论到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讨论等,极大地活跃了文论界的学术思想,强烈地冲击了传统研究范式和思路,开拓了文艺学研究视野和思维空间。第二阶段先后掀起了人文精神和新理性精神文论的讨论,各种西方文论思潮被大量引进,极大丰富了中国文论概念和话语,随后引起了“失语症”以及“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的深入讨论,对当代中国文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第三阶段文论界相继提出并展开了“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文化研究转向”讨论、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争鸣、图像和视觉文化问题讨论、“文学终结论”的讨论、“强制阐释论”的讨论等(朱立元 74—90)。论者详细描述和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接连不断贯穿始终的学术争鸣,以及这种论争所展示出来的不断追求理论创新的强劲生命力,但是对于这几个阶段当代文论在不断论争中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演进逻辑,却似乎未能进行应有的揭示。此外还有学者把近40年文论变革发展划分为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三个阶段,偏重于从当代文论的整体性转向着眼进行观照和总结。“新时期”文论以思想解放、形象思维讨论和文艺“向内转”为标志,成为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的精神起点,由此走向了文艺理论探索发展的新天地。“新世纪”文论以全球化与文学研究的跨界与扩容为特点,走向与其他学科交叉的跨界研究,使当代文论研究领域得到了很大拓展,但也出现了跟着西方学者走而脱离中国现实等新的情况和问题。“新时代”文论所面临的突出任务,是如何在吸收古今中外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建立既是当代的又是中国的文学理论(高建平 32—39)。这种三阶段划分以及对当代文论整体性转向的观照视角都颇有新意,但似乎仍未揭示出当代文论变革发展的内在演进逻辑。

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各有特点和意义,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的仅限于对某些当代文论变革发展现象的描述,而没有深入它的内在机制和演进逻辑层面进行考察;有的虽然对此有所揭示,但往往将其视为一种直线性的历时态演进,没有充分揭示其中的复杂性。在笔者看来,当代文论的变革发展,无论是其外在发展轨迹还是内在演进逻辑,都不是简单的直线性推进,而是颇为复杂

的螺旋型循环演进。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个层次来进行观照分析。

首先,从表层结构方面来看,正如上一节所描述的那样,新时期以来文论的变革发展,是在破、引、建三者交织互动作用下不断循环演进的发展进程。其实,如果我们放宽一点视野来看,应当说近百年来,中国现当代文论都是在中外古今交汇的时空背景下,在中外各种理论资源彼此冲突与融合的历史语境中,在破、引、建三者交织互动的作用下变革发展过来的。20世纪初“文学革命”浪潮中在西方文论影响下的文论转型,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文论模式影响的文论形态建构发展,新时期以来文论的变革发展,从宏观历史视野来看构成了三次大的破、引、建交织互动的循环演进。之所以形成这样一种演进逻辑,显然与处于历史大变局中的社会文化结构有关。一方面,处于时代巨变中的文学与文论需要破除旧的文学观念的羁绊,才能开辟新的生长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只有着力建构新的文学观念,才能适应新时代文学与社会变革发展的新要求。然而实际上,无论是“破旧”所需要的理论武器,还是“立新”所需要的理论资源,都难以从过去时代的传统文化资源中获得,而是需要从外国文论资源中引进和借鉴,因此,破、引、建三者交织互动发展就成为必然的演进逻辑。这无论从近百年来中国现当代文论变革发展的宏观视野来看,还是仅从新时期以来文论变革发展来看都是如此。

其次,再从深层结构方面来看。新时期以来文论螺旋式的循环演进,反映了文学研究内与外关系维度上的辩证运动和演进逻辑。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代西方文论演变的影响,当然更有当代中国文论变革的现实根源和基本特点。

我们不妨以当代西方文论的历史演变为参照来看。学界普遍认为,20世纪西方文论总体上经历了从外部研究走向内部研究,再走向外部研究,然后有所回归的演进过程。总体而言,西方文论在20世纪之前主要是外部研究,20世纪初从形式主义文论开始转向内部研究,建立了关于内部研究的种种理论形态;然后在20世纪中期以解构主义为先导发生向外转,形成后来盛极一时的文化研究转向;20世纪末以来又形成所谓“后理论”转向,出现某些回归文学理论研究本身的发展趋向。那么,它所关涉的文学研究内与外的关系维

度究竟是怎样的呢?或者说其中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呢?在笔者看来,它至少包含三重维度:一是基于作品文本内外关系的维度,二是基于文学对象与研究目标的维度,三是基于研究方法的维度,这几个方面往往相互交织,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最初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为标志的向内转,主要是针对此前社会学派的文学研究过于强调作品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力图转向以文本分析为中心和以“文学性”为目标的研究方向,后来韦勒克等人也正是从着眼于作品文本的内部还是外部关系来区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20世纪中期的向外转,可以说是以“文学性”问题作为转捩点。“文学性”作为形式主义文论的关键概念,主要指文学作品文本的语言陌生化及其文本结构特征,它被认为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根本标志,成为形式主义文论所确立的研究目标。后来“文学性”理论得到不断阐发,于是带来了两个变化:一个是它的涵义不断丰富和扩大,即不再局限于作品文本的语言形式,而是把关涉文学基本特点的各种因素如修辞性、虚构性、故事性、叙事性、象征性、隐喻性、审美性等都纳入其中,这样它的所指就十分宽泛了;二是在一些人看来,“文学性”并不只是在文学作品中存在,在文学作品以外的其他文本中也普遍存在,因此,文学研究不一定要局限于文学作品,而是可以扩大到文学以外的各种文本,这就出现了作为文学研究对象与目标的由内转外,即转向了“文学性”泛化的文化研究。而文学研究一旦转变为文化研究,那么也就不一定局限于研究“文学问题”,而是不知不觉中转向研究“文化问题”,而且研究方法也越来越转向跨学科的开放性研究,这样的向外转就更加没有边际了。由于这种极端化转向发展过于背离文学研究的意义指向,所以才在后来的“后理论”转向中引起西方学界的理论反思,并且形成某种意义上向文学研究的回归。

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内外转向发展显然有很大不同。所谓“文本论”意义上的内外转向,虽然有所关涉但实际上并不太突出,而且不太具有独立和单纯的意义。此外特别凸显出来的主要是两个关系维度:一个是基于“文学论”的关系维度,关涉对文学特性与功能的理解,以及对文学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的认识;另一个是基于文论资源的内外关系维度,关涉内承传统与外引资源之间

的关系问题。

从前者来看,新时期初文论变革中的破与建,主要在于打破反映论和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他律论”文学观念与理论模式,这被认为是一种特有的文学外部规律研究。随之而来的“向内转”,不是像形式主义文论那样转向“文本论”的内部研究,而是转向“文学论”的内部研究,即转向重视文学本身的特性和规律,如审美性、情感性、人文性、语言艺术特性等,从而建构“自律论”的文学观念与理论范式。当然,这种文学“自律论”的理论建构实际上又有各种不同的目标指向与理论形态,如纯审美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主体论或人的文学论、语言艺术本体论等。随着大众文化兴起和纯文学遭遇“终结论”挑战,上述“自律论”的文论范式连同此前的“他律论”文论模式,又全都被当作“本质主义”的东西予以质疑与解构,于是当代文论再次向外转,但它不是回到原来的外部研究,而是转向更加宽泛的文化研究,即不再局限于文学对象以及文学本身的特性、规律和意义价值,几乎所有文化对象与文化问题都可纳入其中。这样一种外向性、开放性变革发展,由于远离文学实践而缺失应有的阐释力,当然也要引起人们的质疑,于是在后来兴起的“强制阐释论”的批判追问之下,文论界加强了理论反思,一定程度上重新回到对文学本体问题及其意义价值的研究探讨,显示出某种向内回归的发展趋向。

再从后者来看,20世纪以来中国文论的变革发展,无不关联着一个如何对待内外理论资源的问题,对此始终摇摆不定和争议不断。改革开放初期要改变封闭已久的局面,当然需要全面引进西方文论资源,一时出现照抄照搬和消化不良现象也顾及不上,当时文论界的整体氛围和文论话语都有很明显的“西化”色彩。这种状况后来引起文论界不少人的反感,于是提出“失语症”问题加以质疑与反思,并进而提出“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以图纠偏,然而实际成效却似乎并不理想。紧随而来的“文学终结论”和“反本质主义”讨论,很快把这种转向进程打断了,学界又转向了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引进和讨论,外来理论资源的影响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其结果是带来了更多的理论迷误。此后兴起的“强制阐释论”以及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重建的讨论,虽然并非要否定和排斥对西方文论的借鉴,但还是希望扭转过于

依赖和盲从外来理论的偏向,这也是内外关系的辩证运动和螺旋型演进的结果。

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外关系维度,一方面各有其自身演变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又彼此交织和相互影响,形成当代文论变革发展的整体性辩证运动和演进逻辑。

三、基于当代文论破、引、建变革发展的理论反思

如前所述,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论是在破、引、建三者交织互动的作用下变革发展过来的,这三个方面本身也都有各自的目标指向,都会涉及一些相关的具体问题,因此有必要从这些具体问题着眼进行一些理论反思,从而达到更深入的理论认识。

一是关于“破”的理论反思。通常说破与立是辩证统一的,没有破就没有立,因此破除旧事物具有革命性意义。但人们对破的理解往往容易简单化,即简单理解为破除、破坏、解构、否定、抛弃等;同时在价值判断分析方面也容易陷入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思维:非此即彼、非是即非、非对即错、非好即坏等等,因此很容易矫枉过正,对此应当要有清醒的理性认识。尤其是理论观念方面的突破,更不应当是简单的否定和抛弃,而理应是哲学意义上的批判反思和辩证扬弃。在西方现代哲学中,“批判”的本意是指通过哲学思考来进行理性辨别,其内核是哲学反思,因此常有“批判反思”的说法。而所谓“扬弃”也显然不是简单的否定和抛弃,而是基于理性辨别而有所取舍,即所谓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促进事物的辩证发展和演进。批判反思与扬弃是内在相通的,扬弃要通过批判反思才能达到。从当代文论变革发展来看,破除旧的文学观念和理论模式束缚无疑具有变革进步的意义,但极端化的解构和否定也会带来新的问题。比如,新时期初大力破除机械反映论和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观念与理论模式,为审美论等新的理论形态发展开辟了道路,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但后来几乎一边倒地批判否定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导致当代文论过于反认识论和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意识形态化,这种片面性及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又如“文学终结论”和文化研究转向,从它旨在突破纯文学研究的局限而言

也是有意义的,但它过度走向反文学本体论和去文学化、去审美化,却又容易导致文学研究目标和意义的迷失。再如文艺学“反本质主义”讨论,就其破除教条化和极端僵化的思维方式与理论模式而言无疑具有历史合理性,但如果走向极端,把文学本质论问题及其理论研究也当作本质主义的东西全都反掉,导致过度去本质化、去理论化和反理性主义,也是大谬不然的,如此等等。经过几十年变革发展,人们的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如今回过头来看,上述这些曾被当作破除对象的东西,其中也并非没有历史合理性的因素,理应通过辩证的批判反思和积极扬弃,适当纳入当代文论的重建系统中来。近年来在关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重建的讨论中,上述各种问题都被重新提出来进行探讨,正可以说明这一点。

二是关于“引”的理论反思。当代文论变革发展始终离不开对外国文论资源的引进和借鉴,但也始终存在各种问题和引起各种争论,那么其中又有哪些东西值得我们进行理论反思呢?实际上,外引理论资源所带来的主要是一个“影响的焦虑”问题。“影响的焦虑”本来是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提出来的一个诗学命题,指当代诗人面对前人强大的诗歌传统,总是希冀能够超越前人进行创新,但实际上却难以摆脱这种传统的影响,于是就会产生一种焦虑感,于是他们就会选择以“误读”的方式和运用各种“修正比”来贬抑前人的诗歌传统,从而树立自己的诗歌创新形象(布鲁姆 3—15)。从我国现当代文论对外国文论的学习借鉴来看,好像也存在类似情况。一方面,中国文论在现代转型发展中总是要不断寻求各种外国文论资源的参照与借鉴;另一方面,近百年来我们又经常为是否过于“西化”和割断传统等问题而纠结与争论,因而总是难以摆脱这种“影响的焦虑”。那么值得反思的问题,一是我们究竟能不能拒绝和排斥对外国文论的学习借鉴。恐怕谁也无法作出肯定回答,因为我们的文论传统中缺少应有的现代性因素,不能不向外国文论学习借鉴。二是既然如此,我们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也许这里的根本问题是,如何真正确立中国文论自身的主体性,包括主体身份、主体地位、主体意识和主体精神等。反思过去我们引进外国文论资源方面的经验教训,如果中国文论的主体性不强乃至丧失,就很容易跟在别人后面照

抄照搬和跟风炒作,随之而来的焦虑和逆反情绪也会比较严重;反之,如果能够确立和强化我们的主体性,真正明白我们自身的现代变革发展究竟需要解决什么问题,知道应当向别人学习借鉴什么东西,就可以避免盲目照搬和东施效颦式模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焦虑感。其实,我们对外国文论的引进研究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客观性的还原式研究,主要介绍各种外国文论知识,了解它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形态;另一种是联系实际的借鉴性研究,其目标是探究我们引入的某种理论具有什么样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可以启发我们用来思考和研究什么样的现实问题。这后一种情况显然更需要增强主体自觉性,有时出于“洋为中用”的借鉴目的而发生某种“误读”或“修正比”也是正常和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和有积极意义的。实际上,我国现当代文论的许多创新建构,如人的文学理论、现实主义文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主体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文学阐释论等,都有引入外国文论加以借鉴吸收的因素在内。反过来说,回顾历史当然也有不少过于西化或教条化的教训。所谓理论反思,也正在于总结这些经验教训而获得应有的历史启示。

三是关于“建”的理论反思。当代文论变革发展的落脚点应该是创新性的理论建构,以此介入现实起到推进当代文学发展的积极作用。比较而言,新时期以来第一轮文论变革发展所取得的创新建构成绩比较突出,而且也在积极介入社会和文学变革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第二轮变革发展的特点,是文论界本身的自我反思得到了加强,但富于创新性的理论建构则显得不足,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自我迷失和焦虑困惑。这既有比较复杂的现实原因,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代西方文论思潮的影响和误导。进入第三轮变革发展以来,当代文论的重建问题再次被提出并且引起讨论,一些具有现实挑战性的问题也再次凸显出来,其中有几个根本性问题是值得特别关注和进行深入讨论的。比如,怎样重新认识文学理论的功能问题。关于理论是什么,美国文论家乔纳森·卡勒认为,理论是跨学科的研究,是对事物所包含的东西的分析和推测,它具有自反性(反思性),包括对常识的质疑与批评(卡勒 16)。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又显然并不全面,有关理论的建设性探究、阐释和思想观念建构的功能,被论

者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和遮蔽了。有些人受到这种理论观念影响,也往往特别强调文学理论的反思性而贬抑其建构性,这只会带来理论功能的不断弱化。实际上,文学理论的反思性与建构性都同样重要,在前者已经得到充分重视而后者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增强文学理论的建构性功能,特别是回应现实要求建构新时代所需要的文学观念,为文学实践良性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观念支撑,应当是更值得倡导和努力推进的方面。又如,怎样重新认识和突出文学本体性的问题。如前所说,文学理论研究跨学科、跨边界的开放性发展已是不争之实,它的利与弊也都显而易见,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克服它的根本弊端,即过于“去文学化”的问题。针对这种弊端,有必要重新认识和突出文学的本体性。真正的文学理论应当坚持以文学为本体,包括以文学现象特别是经典性作品和创新性文学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新时代面临现实挑战的文学问题作为主要研究目标,以寻求当今时代文学与人们生活的价值关系即文学意义作为主要价值取向。当代文论研究的开放性,主要表现为研究方法方面的多向度借鉴与开拓,而在基本理论观念方面仍然应当坚守以文学为本体,否则就失去了作为文学理论研究的意义价值。再如,怎样重新认识和强调文学理论的实践导向问题。文学理论不只是一种知识形态,而且应当具有实践品格。当代文论更应当始终面向文学现实,关注文学实践的发展趋向,研究当前文学发展现实中提出的问题,积极回应社会对于文学的现实关切,通过文学观念建构为文学实践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历来有影响的文学理论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和功能,我们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北京: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

[Bloom, Harold.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Trans. Xu Wenbo.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

[Culler, Jonathan. *Literary Theory*. Trans. Li Pi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13.]

高建平:“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论的三次转向”,《中国文艺评论》11(2018): 32—39。

[Gao, Jianping: “The New Era, the New Century and the New Age: Three Turns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 the Forty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Literature and Art Criticism* 11(2018): 32 - 39.]

鲁枢元 刘锋杰:《新时期40年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史》。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

[Lu, Shuyuan, and Liu Fengjie. *Forty Years' History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in the New Era*. Hangzhou: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8.]

曾繁仁:《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Zeng, Fanren. *O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e New Era of China*.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朱立元:“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演进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1(2018): 74—90。

[Zhu, Liyuan. A Retrospective Reflection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Its Evolutio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11(2018): 74 - 90.]

(责任编辑:王嘉军)